

疾病与时尚的观念交织

——医疗社会史视角下的民国成都娼妓及其日常生活

李 龙¹, 童华文¹, 刘建平²

1.成都博物馆研究部,四川 成都 610015;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办公室,四川 成都 610015

摘 要:民国成都的娼妓数量众多,性病的社会传染问题特别突出。在各种性病治疗方式中,西医的九一四标准化治疗以其有效性与方便性,成为社会认同的最优治疗方案。娼妓、性病与九一四等性病药品建构了普遍认知中的娼妓生活。与此同时,脂粉、美容药品与时髦穿着等符号表征,又建构着娼妓生活的另一个面相。娼妓的“疾病”与“时尚”,对于宏大的历史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碎片,但是对于历史的整体重构却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国成都;娼妓;疾病;医疗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R-09

文献标志码:A

章编号:1671-0479(2018)06-434-004

doi:10.7655/NYDXBSS20180605

近年来,许多学者在慨叹史学的碎片化,认为当前的历史研究缺少系统性、总体性。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史学实际上就是“一门碎片为基础的学问”,“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1],因此,碎片化的历史对于重构社会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宏观历史的高度出发,娼妓只是社会的一个微小面相,由她们的“病”与“美”所引发的问题也只是历史的小碎片,但是,这却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民国以前,人们对娼妓的否定更多集中在意志消磨等精神损害方面。民国以后(实自清末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开始),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到娼妓的性病传播问题,从精神逐渐转向于实际的身体健康等方面,医学社会学的意义开始凸显出来。娼妓生活的“丑陋面”就开始更多地由性病相关问题来建构。与此同时,成都的娼妓也逐渐开始摆脱传统社会评价的束缚,进而通过外在的“美”与“时尚”建构着她们作为女性的另一个时髦新世界,这个世界也是作为女性而存在的必然生活世界。

一、成都的娼妓与性病

王笛认为,关于成都娼妓问题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2]。15世纪的一首竹枝词写道:“‘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君莫作‘锦城’游。”^[3]在这首竹枝词中,作为妓女的蜀姬更多还是指艺妓之类,她们对普通男性,特别是年轻子弟有相当的诱惑,“子弟寻花‘新巷子’,

‘玉河’河畔亦消魂。几回不遂狭邪兴,‘川主庙’前半掩门”^[3]。

民国时期成都的妓女主要有公娼、艺妓、扬州客妓、私娼与野娼等五大类。其中,公娼集居于武城门内新化街、顺城街、天涯石街等处,艺妓散居各街,扬州客妓散居于如是庵、干槐树、华兴东街、新巷子、藩署街、拐枣街、西御西街、新玉沙街、爵板街等地,野娼则于夜间主要活动于春熙路、东大街、玉石街、中山街一带。成都娼妓自清末“监视户”改革起,实行集居制度,但是由于私娼活动猖獗,娼妓人数并无准确统计。据官方统计:1934年,成都有娼妓885人^[4],至1936年更达1798人^[5]。而据白景纯的估计,成都妓女队伍特别庞大,“估计为3万多人,占当时成都市人口的1/10”^[6]。白景纯的估计过于庞大,大概他把所有的相关行业从业人员都计算在内。大致而言,19世纪30至40年代成都娼妓人数在数千人之数应该较为可信。

社会学家认为:“卖淫表达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维持——男人把女人当成了为其性目的而‘使用’的对象这种趋势。”^[7]正是基于这种“使用”,使妓女一般成为了最主要的性病传播中介。“妓女据说是性病感染率最高的人群,她们在传染链上起着最为邪恶的作用”^[8]。据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对成都妓女的调查,1939年被查验的妓女共535人,无疾病者仅16人,占总人数的2.99%;患淋病者215人,占总人数的49.16%;赖性下疳者39人,

收稿日期:2018-04-07

作者简介:李龙(1983—),男,四川岳池人,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医疗社会史与地方文化。

占总人数之7.29%;梅毒38人,占总数的7.11%^[9]。1936年,据省会公安局对东六区525名妓女的检查,只有16人无病(表1)。陈雄注意到,“妓女大都染有性病,但是她们无多的钱去请花柳医生,所以,性病与妓女成了不可分离的样子,很多妓女都因性病的蔓延而死。”^[10]

表1 1936年成都妓女患病种类及人数表

指标	淋病	梅毒	下疳	横痃	结核	正常
患者数目	401	251	128	129	125	16
百分比(%)	73.58	49.16	7.10	7.29	6.45	2.99

资料来源:《成都快报》,1936年3月12日。

妓女的性病更多呈现特别强烈的交叉传染性,主要通过男嫖客发生。黄克武认为:“男性的隐疾从广告上看主要是梅毒、白浊、下疳、横痃等,病因则多因接触妓女遭病毒感染。”^[11]在成都,由于集居制度的推行,新化街几乎成为“花柳梅毒传播所,下疳白浊大本营”,妓女与嫖客十有九要得这种病^[6]。

1934年,鉴于娼妓性病传播的严重性,省会公安局“以本市娼妓甚多,久未检验,染花柳病者不少,因恐传染市民,遗害社会”^[12],颁布了《检验娼妓条例》,由公安局所办之平民治疗所对娼妓进行检验,娼妓有无疾病,均须每月一号至五号,前往检查,并予一定治疗,而有病之娼妓立即停止营业,待病愈方准营业^[13]。但是,由于在“整个民国时期,妓女问题从未解决,反而进一步发展”^[2],娼妓始终没有废除,娼妓的性病患病比例长期居高不下,成都社会的性病患病率也处于较高水平。

亨利厄特估计民国时期中国城市中的梅毒患病率为10%~15%,淋病患者则更多^[8]。疾病总是趋向于治疗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药品销售就是一定社会需求及其社会环境的非常重要的客观表征。性病的普遍流行,使性病药品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特别是作为西医标准化治疗方式的九一四(由六〇六改进而成),其销售更是活跃。贺萧在讨论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民国时期,西医对于梅毒的标准治疗方案是注射洒尔佛散(六〇六)”,后来,“新洒尔佛散(九一四)取代了老的制剂,成为治疗的首选药”^[8]。新洒尔佛散每年的进口值相当大,1934年达50万元,而至1935年更超过81万元^[14]。

在成都市场上销售的九一四主要是法国皮隆居的九一四与美国雅培的九一四,以及中法大药房所出之九一四内服新药、九一四外用膏与九一四白浊新药等。据《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载:“美国雅培出品、法国皮隆氏九一四和培生厂制剂在重庆、成都很有市场。”^[15]其在中国由立兴洋行总经理,“砒制梅毒圣药,静脉注射”^[16]。老牌的谦信洋行经销的德国狮牌新六〇六也还有一定市场。1936年,谦信洋行以东施效颦为喻作广告即说:“德国狮牌新六〇六(新洒尔佛

散)治梅毒之神药也,历时廿载,信誉益著,后世仿冒贗造之品日出,颇思混朦世人耳目,与之并论,殊未知其品质之优劣,判若霄壤,何能望其项背,见美而效益显其丑,亦东施之流欤。”^[17]

九一四多为洋行代理,是成都各大药房销量最大的性病类药物。在成都各大药房主要销售的24类成药中,九一四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小九一四膏与小九一四水,小九一四水价格一般为小九一四膏的数倍。以1943年3月份小九一四膏与小九一四水的销售为例。当月,各大药房共售出小九一四膏413打6盒,小九一四水14打5瓶。小九一四膏的销量仅比金灵丹、万金油、阿比片少,居第四位^[18]。

按照1943年成都市评价会议所核定的新药价格,小九一四膏批发每打80元,零售每盒10元;小九一四水批发每打650元,零售每瓶70元^[19]。按零售价计,3月各大药房售出的小九一四膏其货值应是49 620元,售出小九一四水的货值应为12 110元,两者相加之和为61 730元,他们的销量在各类成药中也居于前列。

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销售货值来说,小九一四膏、小九一四水这两种性病药品在民国成都各大药房的药品销售中都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能负担九一四这种效果特别显著的新药,很多其他药品(主要以汞治疗为主)大概是当时成都性病药品销售主体。这些性病类药品价格一般较为便宜。如专治白浊的日产利比儿与国产之乐能,以及华洋大药房制售的花柳扫毒丸与总经销的梅毒克星、华荣西药房总经理的麦司甘白浊丸、建国大药房总经理的除浊克淋丸、华西药房代理的灭毒洋碘浆等。

由于性病药品的利润丰厚,各大药房以及一些专科诊所一般都大肆为其性病药品刊发广告。翻开每一份报纸,其都有大量篇幅刊登性病药品广告,主流报纸如《新新新闻》、《川报》等每天多达数版的医药广告。其中还有许多是以伪药骗人。春熙路的“袁四能诊所”、东华门的“韩朝宗诊所”等,自我标榜“专治五淋白浊”、“包打梅毒针药”等,四处张贴广告,实则自造假药,骗人钱财^[20]。

二、美容药品与时尚

性病与九一四等性病药品是我们对民国成都娼妓生活的普遍认知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它们建构了我们对民国娼妓生活认知的主要观念世界。在这种认知中,这个世界是肮脏与丑恶的。与此同时,在这个主要观念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关于“美”与“时尚”的世界。这个世界主要来源于作为女性的娼妓内心对“美”与“时尚”的追求,也来自于作为顾客的嫖客对“美”与“时尚”的追捧,更来

自社会对“美”与“时尚”的认同。这个世界则主要是由脂粉、美容药品以及装束等象征元素构成。

脂粉、美容药品等化妆品的使用,从古至今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自民十以还,偏处西陲之四川,教育日渐发达,文化日趋进步,而社会间之奢侈虚糜,亦与日俱增,女性天然之爱美心,自必日新月异”^[21],四川地区的化妆品消费也开始日趋活跃。成都妇女使用新式化妆品亦大概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变得很普遍。一些竹枝词中即大量出现新式化妆品的身影,如“‘双妹’老牌花露好,担心蜂蝶要分香。化妆物品日加优,扑粉雪花茉莉油。可怜失爱胭脂口,无缘再上美人头”^[3],和以夏士莲为咏诵主体的“盥罢凝脂肤未干,痴婢笑取夏士莲,糊一遍,又一遍,玉样人儿受人怜”^[22]等。力士香皂等当时还可归于化妆品之类的日用品,也主要强调其对于女性皮肤的美容效果,并主要在各大西药房及百货店销售,消费量相当大^[23]。据统计,1933年,全国脂粉香水总进口额达150余万。1934年1至4月进口脂粉香水即已达257 245金单位,折合国币计527 870元。虽则较1933年同期的298 434金单位略有减少,但较多是受经济不景气影响^[24]。1936年,四川大陆社记者对重庆1933年至1935年化妆品货物进行调查:1933年进口化妆品约值本491 621元,1934年约值本189 632元,1935年约值本276 851元6角4仙,三年总共进口化妆品958 104元6角4仙^[25]。1936年4月,重庆进口化妆品总计832件,值88 743元4角;5月进口940件,值61 903元2角6仙;6月进口568件,值18 566元^[26]。对比同一时期重庆进口的药类(药材、熟药与新药)量:1936年4月重庆进口品药品1 459件,值89 251.80元;5月3 296件,值192 483.72元;6月2 329件,值192 483.72元^[27]。化妆品进口数值约为药类进口的1/3。有鉴于此,很多人进而开始呼吁:“当此国难严重,农村经济破产之秋,民众亟应崇就俭朴,以图挽救。”^[26]同时,由于化妆品较多地关注于女性皮肤,尤其是面部皮肤^[11],因此,许多皮肤用药也宣称自己具有美容之效。如针对粉刺、雀斑、烟容、疮疤等皮肤问题的药品,它们在民国成都销量一般也非常大。韦廉士如意膏的本来作用只是针对普通的皮肤病患,但是它的广告就主要集中宣传其对于容貌的作用^[28]。

与性病类药品相似,成都的脂粉、美容药品等化妆品仍然较多是以妓女为主要消费人群。《成都通览》载:“脂粉一项,以监视户及公馆内之销场为最多,若学生等则洗净铅华矣。”^[29]脂粉、美容药品广泛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妓女的风尚引领。早期较多只能是公馆里的女子所用的脂粉、美容药品,妓女也可使用,其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

同时,妓女的“胆大妄为”与“抛头露面”必然会带来广泛的模仿效应,因而民国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脂粉、美容药品的销量实际上非常大。

与脂粉、美容药品使用相比,穿着是更为外显的时尚表征。虽然一些妓女(主要是民国成都的土娼)在努力弱化其妓女身份,在外装束特别简单,但也有些妓女(主要是扬州妓女等高级妓女)却敢于在公开场合炫耀、卖弄自己。王笛注意到民国初年一个妓女的故事,这个妓女“头梳大毛辫,戴绿泥遮阳帽、金丝眼镜。穿披青缎中式时样皮袄,扎脚青裤,批西式白色洋头绳。大披肩、电光褂、花绿色出风毛新式朝元鞋”,沿街笑骂。当警察申斥其行为时,其竟形态自若^[2]。当扬州妓女到成都之后,这种表现更为明显。扬州妓女一般比川妓穿着更为华丽时髦,而常被成都人视为“奇装异服”^[30]。在普通民众眼中,新潮的服装、精致的配饰与海派的发式,较多地也就成为了妓女的代名词,“‘正派’但穿着时尚的女子往往会被误认为妓女”^[12]。反过来说,在民国成都,妓女已然不自觉成为了时尚的代名词。同时,妓女通过各种方式去表达着这种时尚,客观上也引领了社会的时尚发展。

黄克武认为:“清末民初以来妇女在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男尊女卑逐渐走向男女平等。”^[11]正是这样的全国背景,成都妇女的地位也开始发生较大变化。王笛认为:“妇女在成都与在沿海地区有不同经历,在沿海城市对妇女的限制较成都要小得多。”^[31]这种限制却自清末开始逐渐减弱,到了抗战时期,成都与沿海城市在妇女地位上的差异已然有倒转之势。倒转首先体现在妇女生活风尚的变化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成都画家俞子丹所画的成都风俗画中,即可见摩登女郎手持一束花枝招摇过市,学生妆束中透露着令人艳羡的时尚^[32]。

三、两个世界与社会重构

以民国成都娼妓的日常生活为例,性病与九一四等性病药品建构了普遍认知中的娼妓生活,但是同时,脂粉等美容药品与时髦穿着等符号表征的“美”与“时尚”的世界仍然较为显著地建构着大众认知,“丑”与“美”的两个世界和谐共存于日常生活当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对于性病与娼妓的否定,并未影响到关于娼妓“时尚”行为的实践;在大众观念与自我行为之间,娼妓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焦虑。甚至在很多时候,娼妓的“美”与“时尚”还超越着“丑”与“病”,引领着社会风尚的发展。从解构与重构的特殊语境出发,以妓女的“病”与“美”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入分析,对于认知特殊时空中社会的整体性面貌有着重要意义,或者说这就是真实社会重构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碎片。

参考文献

- [1] 罗志田. 非碎无以立通: 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J]. 近代史研究, 2012(4): 10-18
- [2] 王笛.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 李德英, 谢继华, 邓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55-256, 264, 269-270
- [3] 林孔翼. 成都竹枝词[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60, 120, 193
- [4] 成都公安局发表户籍统计[J]. 四川月报, 1934, 5(5): 179
- [5] 蓉市居民职业调查[J]. 四川月报, 1936, 8(5): 221-224
- [6] 白景纯. 解放前成都娼妓概况[M]//《文史精华》编辑部. 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470, 472
- [7]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第四版)[M]. 赵旭东, 齐心, 王兵,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72
- [8] [美] 贺萧. 危险的愉悦: 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M]. 韩敏中, 盛宁,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41-243
- [9] 成都市政府秘书处编. 成都市市政统计·卫生[M]. 成都: 成都市政府, 1940: 11
- [10] 陈雄. 成都社会特写[Z]. 1946
- [11] 黄克武. 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 1988: 182, 185-186
- [12] 娼妓患花柳恐传染市民[N]. 成都国民日报, 1934-07-13
- [13] 成都公安局检验娼妓条例[J]. 四川月报, 1934, 5(2): 140-141
- [14] 薛愚. 中国药史[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442
- [15] 上海医药公司, 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101
- [16] 立兴洋行九一四广告[N]. 成都国民日报, 1934-07-01
- [17] 狮牌新六〇六广告[N]. 新新新闻, 1936-01-09
- [18] 成都市新药商业同业公会造报 1943年3月份存货统计表[Z]. 成都市档案馆馆藏, 档案号 104-2-1173
- [19] 成都市评价会议第十次审查会议核定新药价目[Z]. 成都市档案馆馆藏, 档案号 104-2-1173
- [20] 王季槐. 解放前成都市的医药卫生[M]//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教科文卫卷上·科教艺苑).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343
- [21] 万县商场之鸟瞰[J]. 四川经济月刊, 1934, 2(5): 1-4
- [22] 咏摩登女郎[N]. 川报, 1932-03-14
- [23] 力士香皂广告[N]. 成都国民日报, 1936-03-02
- [24] 香水脂粉消耗惊人[N]. 成都国民日报, 1934-07-13
- [25] 渝市三年来化妆品进口[N]. 万州日报, 1936-06-05
- [26] 渝四五月进口化妆品统计[J]. 四川经济月刊, 1936, 6(3): 28
- [27] 重庆二十五年一至十一月药类进口统计[J]. 四川月报, 1937, 10(2): 100-101
- [28] 韦廉士如意膏广告[N]. 成都快报, 1935-01-01
- [29] 傅崇矩. 成都通览[M].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6: 54
- [30] 秀清. 成都的扬州妓女[M]//《文史精华》编辑部编. 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483
- [31] 王笛.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75
- [32] (英) 徐维理. 龙骨——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老成都”[M]. 俞子丹, 绘. 萧冰, 译.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4: 26-27

The mixed idea of disease and fashion: Chengdu prostitutes and their daily lif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Li Long¹, Tong Huawen¹, Liu Jianping²

1. Research Department, Chengdu Museum, Chengdu 610015; 2. Administration Office, Chengdu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hengdu 610015,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prostitut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Chengdu. Many prostitutes suffered from a venereal disease and spread these diseases, the venereal disease became a very serious social problem. Neosalvarsan wa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solution because of its effectiveness and convenience. Venereal disease and neosalvarsan constructed the general cognitive about the prostitutes'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stitutes' life was considered to be "beautiful" and "smart" because of some symbols, such as cosmetics, cosmetic medicine, fashionable dress, and so on. The disease and beauty just were some historical fragments, but, they played a vital role in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history.

Key words: Chengdu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stitute; diseas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